

论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与郑观应在经济思想方面的渊源关系

葛 群

(东北财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体现了郑观应成熟而完整的维新思想,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投身社会变革,无不受其影响。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他们在经济思想方面与郑观应的渊源关系。

关键词 郑观应;盛世危言;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 F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1X(2011)36-0010-03

郑观应(1842—1921)是中国近代思想先驱,中国近代思想体系最完整的理论家和热忱的爱国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部体现郑观应成熟而完整维新思想的《盛世危言》面世。《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剂拯危于安的良药。《盛世危言》该书面世,即获当时知识分子一致好评,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供不应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礼部尚书(教育部长)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读毕赞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时人称其为“绝世雄文”,彭玉麟也在序言中称此书将会使孔孟之道风行海外,为“安内攘外之说”、“时务切要之言”。晚清著名维新学者陈炽对郑观应嫁接西方议会民主与中国三代政治的努力非常赞赏,谓“西法乃中国之古法,不可拒绝”,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郑藻如对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也相当激赏,为其作序,赞其有女娲补天之功:“《盛世危言》之切直,洞中夫时局之隐微,斯不啻李将军射虎之矢,靡坚不摧。若采而见诸施行,则女娲氏补天之石不是过也。”张之洞点评《盛世危言》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以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盛世危言》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投身社会变革,无不受其影响。康有为、梁启超从中获得启迪,孙中山、毛泽东也从中受到教益。他们的经济思想与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无不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一、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及其意义

在《盛世危言》提出“商战救国”口号的郑观应,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实业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曾当过买办,经营过洋务,还通过捐买官爵而挤入仕途,后来成为

早期维新派的重要理论家,也即别人称之为的“买办学者”。他在实践过程中,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著书抨击时弊,并提出补救措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纲领,逐渐形成了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其以历史的发展眼光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批判,提倡“振兴商务”、“以商立国”,主张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抵制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维护民族的经济利益;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建立近代金融和财政体制。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在唤起民族觉醒,探索民族振兴之路,推动近代工商业发展,捍卫国家经济利益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商战论”的主要观点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就是发展民族经济、在经济方面与外国资本主义斗争的主张。即主张跟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商业竞争,抵制外国侵略,强调“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提倡西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商战的实质,就是要动员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同列强展开经济的角逐,逐步收回已失的利权,这也是商战所要实现的最直接的目标。

1.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与“兵战”并举。郑观应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他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实际上是围绕着对外经济侵略进行的,是为商战服务的:“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培克,敝国无形”。他还尖锐地指出:“商能灭人之国”,“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因此,他认为要有效地抵抗外国侵略,必须兵战与商战兼备,而且后者更为重要:“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为同资本主义列强进行“商战”,他主张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亟宜联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

收稿日期 2011-09-28

作者简介:葛群(1970-),女,内蒙古通辽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

战,以固其本”,以做到“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指出只有在商务得到充足发展使国家富强之后,才能在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使兵强。即商战求富,兵战求强。兵战的物质基础在于商战,故应商战居先,兵战随其后,商战与兵战相互配合。

2.“以商为本”、“以商立国”。郑观应指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也。”即要和资本主义列强决胜于商战,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观点和战略原则(马敏:《中国近代化思潮的一个侧面——商战》)。

3.建立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郑观应非常重视机器工业在进行商战中的作用,他指出:“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中国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工业,只要生产出能够同洋货竞争的各种物美价廉的商品,才能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最后决胜于商战。

(二)决胜于商战的主要措施

1.摒弃“重本抑末”、“贱商”、“轻商”的传统观念。郑观应认为:“苟能一变隆古之习,视商如士……礼以待之,信以任之……商籍准就近应试,殷商准接见官长,商品既重,商人自多,商户既多,商力愈盛。商力盛则气势转,气势转则商务旺。”即要营造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

2.设立商部,制定商律。郑观应主张在朝廷设商部,总管工商事务,兼辖南北通商事宜;国家应该制定商律,既能为商人的经营活动提供法律保障,同时也为解决商事诉讼提供法律依据。

3.改革关税制度,裁撤厘金。为了能有效地进行商战,郑观应认为清政府应修订与外国所签的不平等条约,重新调整税则,减轻出口货税而增加外来入口货税;为使商战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他主张收回海关管理权;为了增强商战的实力,他还要求减轻对商人的捐税负担,并给予商人自由投资的权利。即实行护商政策。

4.实行君民共主的议会政治。郑观应提出:“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即要发展科学技术与近代工商业以致富强,必须改变封建专制制度。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方案就是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

5.引进西学,培养新式人才。郑观应认为,要“制胜”克敌,还必须培养新式人才,学习西学;必须废除旧学堂,设立新式学校和废除八股科举制度。郑观应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理论,同时还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他将民主、科学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指出体用须得一致,国家方能富强。将学习西方科技与学习西方民主议政制度结合起来建设近代国家,郑观应的言论已远远超出洋务派思想家们自强、御侮的变革要求,成为近代维新运动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人物。

“商战论”的进步意义体现在:它始终贯穿着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主张,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奠定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影响过以后许多杰出的爱国者和革命者(1984年,常

汝琪《郑观应的商战论》)。郑观应这代买办出身的民族资本家,经历了从传统中国农业社会蜕变至近代工业社会的过程,并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他们的努力,传统中国“贱商”的思想开始向“洋务救国”、“正途大业”上转变,中国早期具备现代化特征的新兴阶级,由此崛起(《民族企业家郑观应》以《盛世危言》提出“商战救国”))。

二、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与郑观应的经济思想的渊源关系

翰啸在《光明学术》发表的《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一文中认为在《盛世危言》中有两大思想最为重要,这两大思想一个被孙中山继承,孙中山的“强国四策”来源于郑观应;一个被康有为继承,即经康有为完善后的商战理论。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年3月19日至1927年3月31日),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广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他阅读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中对康有为影响最大的还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三大主张,在“变法”中讲的主要就是郑观应的商战理论,如孙中山一样,康有为对郑观应的商战理论进行了变通和完善,康有为的《上清帝书》最核心的一句,是“以兵灭国,国亡而民存,以商灭国,民亡而国随”,可以说这句话真正点透了商战的本质。

三、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与郑观应的经济思想的渊源关系

孙中山不仅是一位革命领袖,而且好学深思、学贯中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从他遗留下来400多万字的言论及著作中,处处显露出高超的理想和过人的智慧。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博大精深,而他的经济思想是在古今中外多种经济思想或流派的影响下形成的。

孙中山的思想也有其渊源。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曾自述其思想的传承:“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传统文化、西方思想及清末民初的时论等可说是孙中山思想的渊源(鄢定友在《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05期《论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中认为,促成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形成,主要有三个理论渊源:一是对中国固有思想的“因袭”;二是对西方近代经济学说的“规抚”;三是

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其中,受到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各种言论的激荡的影响中分量最大的有两位,首先揭示孙中山一生最憧憬的理想社会即儒家的大同社会的是清末中国思想界重镇的康有为,其所标揭“天下为公”的理念对孙中山有深刻的影响。另一影响孙中山思想的人物是1892年发表《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孙中山与郑观应同为香山县人。孙中山比郑观应小24岁,属于晚辈。1887—1892年间,孙在香港西医学堂求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其时郑观应亦在澳门养病,两人多有往来,相谈甚欢。《盛世危言》中的《农功》一篇,是郑观应与孙中山合作的产物。郑观应指出:“外国富强之道,不全在坚甲利兵,而包括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曾采用这些论点。他借用了《盛世危言》自序中一段话的大意:“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赋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孙中山略为变通,改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这四点被后人称为孙中山的“强国四策”。

孙中山突破“重农抑商”的传统,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提出同功论,率先接受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与郑观应的思想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孙中山的“强国四策”和康有为完善后的商战理论,到现在看来仍然不落伍,如果历史上人们非常务实地宣扬孙中山的“强国四策”和康有为的“商战”思想,中国的面貌应该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不得不承认:领袖就是领袖,他们看问题往往很容易抓住问题的本质。

四、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与郑观应的经济思想的渊源关系

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一般认为是:(1)新旧儒家思想即朱熹的孔子主义与杨昌济的孔子主义(后者代表了起程朱,中经船山,迄于康谭的孔学);(2)传统的游侠思想,特别是由水浒传集中表现出来的劫富济贫主义;(3)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

少年时代毛泽东离开私塾,辍学在家,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这就是他的半耕半读时期。一方面助父耕种,一方面继续自学。少年毛泽东偷偷地利用晚上的时间读他能找到的“新书”,“凡乡间能借到的书几乎都读尽了”(见李锐著:《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在他所读的书籍中,计有十一本《新民丛报》以及广东人郑观应等“一些旧式改良派学者”所写的《盛世危言》。据毛泽东自己后来在回忆中对斯

诺说,他“非常欢喜这本书”(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对于孤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盛世危言》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书,是顿开茅塞的读物。其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对他来说是相当新鲜的,特别是郑观应“以中学为体,辅以西学”的主张,对他很有启发。他意识到中国绝不能守着祖宗的老样子不变了:“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父亲)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虽然夏东元先生认为,少年毛泽东的理解有误:“尽管这一自述常被引用——作为《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例证——但是,如果斯诺记载无误的话,那么,13岁的毛泽东其实并未读懂《盛世危言》。与少年毛泽东的理解恰恰相反,作者郑观应对晚清改革专注于引进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其实持批判态度。郑氏急于要引进中国的,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具体而言,是议会民主制度”。但不可否认,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对毛泽东展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开阔了毛泽东的眼界。

《盛世危言》等书唤起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他后来对斯诺回忆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他读的这本书,对他“发生了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他对斯诺说的:“《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作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最后几经周折得到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新学,最终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在建国后,毛泽东并没有延循郑观应的“商战”之说。所以有人感叹:“不知毛泽东13岁辍学在家读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时,有没有注意到郑观应的‘商战’之说;可能是忘记了,也可能是为马列主义经济理论所困而别无选择。”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提倡商业民族主义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我们可以断言,郑观应的思想观点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从经济角度全面地解释了世界历史和具体地解释了西方的社会。”——《剑桥中国晚清史》(1986)。无怪乎中国历史上这么多重要人物受他的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了。

参考文献:

- [1] 邱彦莉.略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J].现代财经,2005,(2).
- [2]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M].北京:信达出版社,1973.
- [3] 强文,刘全奇.试论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发展与演变[C].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华民族振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
- [4] 马敏.中国近代化思潮的一个侧面——商战[EB/OL].http://www.xinfajia.net/2091.html.
- [5] 翰啸,高连奎.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G]//中国大形势.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 [6] 夏东元.郑观应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刘娇娇]